

Mancur
Olson

[美] 曼瑟·奥尔森

——著

李增刚

——译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经济增长、滞胀
和社会僵化

国家的兴衰

国家的兴衰

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Mancur Olson

[美] 曼瑟·奥尔森
——著

李增刚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美)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著;李增刚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ISBN 978-7-208-14668-6

I. ①国… II. ①曼… ②李…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4210 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封扉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国家的兴衰

——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

[美]曼瑟·奥尔森 著

李增刚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5 插页 4 字数 220,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68-6/F·2473

定价 62.00 元

奥尔森和《国家的兴衰》

曼瑟·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1932—1998）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理论等在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奥尔森逝世后发表的讣文中指出，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很可能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最终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逝世了。许多经济学家把他看作是一个单一观念思想者，而且私下里认为，其思想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还不如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大，例如政治学界。^{*}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得知奥尔森逝世的消息后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

^{*} “Mancur Olson, Scourge of Special Interests”, *The Economist*, March 7th, 1998.

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奥尔森一生著述不少，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三部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和《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Basic Books, 2000）。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已经翻译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国文字；《国家的兴衰》被翻译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权力与繁荣》也已经翻译成了多国文字。

《国家的兴衰》是奥尔森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一生致力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兴盛发达，有的国家不断衰落？结合《集体行动的逻辑》和《权力与繁荣》两部著作，《国家的兴衰》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为《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姊妹篇，《国家的兴衰》是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理论基础的。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明确指出，相关的理论命题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都已经有所阐述。但是，奥尔森仍然采用一章的篇幅阐述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主要思想（本书第二章）。在此基础上，奥尔森提出了关于国家兴衰的九个核心命题（本书第三章）。本书的其他章节主要围绕这些命题，采用横向比较（不同国家）和纵向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相结合，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战后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增长，有的国家却相对衰落了；为什么有些曾经在历史上非常强大的民族衰落了，有些在历史上不见经传的国家强大了。这一方面

验证了其理论的强大解释力，另一方面也对国家兴衰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独具创新的解释。

《国家的兴衰》虽然要研究的问题是国家兴衰的原因，但这部著作似乎以更大的篇幅在讨论国家衰落的原因，而对国家繁荣的条件却讨论不够，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权力与繁荣》。

在《国家的兴衰》中，奥尔森从分利集团多少、分利集团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但对国家繁荣的一般条件未作概括。同时，他对国家衰落的原因却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在长期稳定、未遭受战乱的环境中，形成了强大的分利集团和分利联盟；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现象（较高的通货膨胀与较高的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特定利益集团的阻碍等。因此，一个国家衰落或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但一个国家的繁荣却似乎不能够完全归因于没有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联盟。换句话说，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一个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存在大量分利集团却似乎不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繁荣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它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提出了“扩展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概念，提出了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繁荣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个人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在第二个条件中，奥尔

森又专门强调了即使在个人权利界定清晰的社会中，也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的强取豪夺：“一是通过游说活动，以赢得符合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立法和法规；二是通过卡特化或共谋行为以操纵价格和工资。”这又回到了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提出的国家繁荣的条件，即不存在或很少存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

总之，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提出了利益集团形成、集体行动达成的条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组织起来可能性的差别；在《国家的兴衰》中，根据不同利益集团组织起来可能性的差别，奥尔森提出一些国家存在的大量分利集团或分利联盟导致了衰落；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进一步发挥特殊利益集团理论，提出了市场经济国家繁荣的两个重要条件。所以说，奥尔森的研究是在集体行动、利益集团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发展、应用的。这也符合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提出的“满意答案应该满足的标准”，采用精练、简单的理论解释大量的现实。

最早接触奥尔森的著作是在2001年。当时我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张宇燕教授开设了一门“名著选读”课程，其中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两部著作，而恰好由我阅读和主讲这两部著作。结果，一接触奥尔森的著作，就被其深刻的理论和独到的见解所征服。后来，张宇燕教授又找来了奥尔森2000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的英文版，并且希望能够翻译出来。我自愿承担了这项工作。但当我们翻译出来之后，发现这本书的版权已经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购得，并请了苏长和翻译。当时，虽然未免遗憾，但也心存喜悦，因为是“玉”，大家都会去抢的。再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一书，我欣然答应。在此，对张宇燕教授在我学习上的引导和范蔚文先生的信任表示感谢。本书的翻译还得到了黄少安教授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项目批准号：04JZD007）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国家的兴衰》已经有一个中译本，是由吕应中等翻译、商务印书馆在1999年出版的，题目是《国家兴衰探源》。在重新翻译的时候，为了尽量避免受到原译本的影响，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都没有再阅读原译本；但我毕竟阅读过原译本很多遍，受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这部著作的翻译历时一年多，在翻译过程中，对这本书的理解不断加深，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我的电子邮箱是：casslzg@126.com。

李增刚

2006年8月于山东大学

前 言

很可能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如此众多的学者指出经济学种种缺陷的时候，竟然有经济学家宣称，扩展现有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近来已引起广泛抱怨的“滞胀”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且还可以部分解释通常属于其他学科领域的诸多问题——许多现代社会的“失控”、英国的阶级结构、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权力和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等，以及西欧国家从中世纪早期的相对落后中崛起并在 19 世纪末成为世界主宰。然而，对我们原来并不满意的东西进行成功的改进、拓展是非常普遍的：有许多原来被人们认为根本不可能的技术，经过进一步发展而变得经济、可靠。经济学也是如此，尽管它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在许多新观念的帮助下，可能会有助

于解释许多以前无法说明的问题。

我们如果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不仅可以发现，最近 10 年来许多经济学家遇到的困窘，而且可以看到两个多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知识进步。我很喜欢引用牛顿的看法，即如果他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牛顿在 17 世纪就可以这样说，那么当代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不论学识深浅，至少都可以宣称有一个很高的出发点。经济学家都是一些公认的天才思想家的继承者，如斯密（Smith）、李嘉图（Richardo）、穆勒（Mill）、马克思（Marx）、瓦尔拉斯（Walras）、威克塞尔（Wicksell）、马歇尔（Marshall）和凯恩斯（Keynes），还包括其他数以百计的出色学者。事实上，经济学巨人们通常也都站在其先驱者的肩膀上，因此当代经济学家就好像是站在天才人物组成的“金字塔”上面。那么，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还是没有预测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出现的经济现实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受技术蒙蔽，只能看到经济学家们通常讨论的眼前现象。本书试图表明，如果我们不怕麻烦，考察一下其他学科领域，将会得到整个图景的不同画面。

部分是因为这项研究包含几个学科领域，或者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试图影响决策者和学生，我尽力采用了一种与在专业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时不同的语言风格。因此，对于首先要考虑的同行人经济学家而言，这本书比实际需要的要详细。但是我相信，任何专业的学者都可以理解这本书的内容（除了某些注释和附加说明外）。幸运的是，我在这里提出的大部分观点，一

且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解释，都是出人意料的简单。

我不仅对许多过去的经济学家心存感激，而且对那些阅读过本书初稿或从本书抽取出来的论文并做过大量慷慨批评的经济学家感激不尽。这些有益的批评是如此详细、分散，我在本书专门加了一个致谢，以尽力公正地处理这个问题。支持本项研究的基金和其他组织不是很多，我在这里提一下。本项研究最主要的支持来源于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济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计划，包括创新过程研究计划、经济学计划和衡量方法与数据来源计划。尽管它们手段单一、需求多样，但这些计划对本书和其他一些专业文稿研究的支持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我对未来基金会提供的资源也深表感激，不仅包括他们的资金支持和细心周到的关照，而且他们同意了我为完成本书而推迟他们关心的另一本书的计划。环境保护署和斯隆基金会也提供了帮助，利曼研究所、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也将我与他们的学者放在一起，为我提供了几个月自由写作的空间。

唯一能够超过我对上述机构感激之情的，是对家人的感激之情。像这样一本书需要许多年的精心关注，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和孩子给了我安心思考的机会，使这些关注成为可能。既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献给我的妻子——艾利森（Alison）的，那么这本书——作为那本书的姊妹篇——献给我的三个孩子就再合适不过了。

致 谢

我的研究策略是尽力说出或写下足以引起大量学术批评的大胆创新的东西，并详细地对那些批评做出回应，然后保持坦率地进行恰当修补、删除或扩展所必需的自信。尽管我相信有些批评是错误的，但我尽力（有时候会不成功）将批评作为提高我理论关注程度必需的证据。因此，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我收到了数以百计人的批评，这些人包括了几乎每个相关专业、几乎每个地区和几乎每种意识形态背景的专家。因此，本书所具优点的一大部分可能要归于我的批评者。

我对每个批评者都心存感激，但数量是如此之大，将他们全都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将他们都列出来需要很长的篇幅。甚至在我知道将沿着这些思路写作本书之前，我

就一直在运用寻求批评的策略；并且我在这本书上运用这种策略的时间是如此之久，以致我毫无疑问地忘记了许多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的名字。在有些情况下，批评者就是很多听众中的提问者，他们的名字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了特殊提到的目的，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些批评者，有些是最近的，有些是为了其他目的特别记下来的，这无疑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尤其对那些给予我帮助价值非常大的人更是不公平。对此我深表遗憾，并且希望我不巧忽略了的那些人原谅我。

在本书更早、更初期的阶段，给我提供重要帮助的那些人需要特别的耐心。对他们，我表示特别感谢。约翰·弗莱明(John Flemming)，《经济学杂志》的副主编，是一个特别伟大、特别细心的早期批评者，很遗憾我从来没有把我准备要发表的论文投给他，尽管他很希望我投稿给他。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是我获得的早期鼓励和帮助的另一个源泉，还有 Moses Abramovitz, Samuel Brittan, Alec Cairncross 爵士, Walter Eltis,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Daniel Newlon, 以及 Thomas Wilson。曾经跟我做过和现在正在做补充研究或合作研究的那些人，对我特别有帮助，主要的有：Kwang Choi, Jean-François Hennart, Gudmund Hernes, Dannis Mueller 和 Peter Murrell。

1978年，罗宾·马里斯(Robin Marris)召集并主持了一次研讨会，对我关于本书第四章专门讨论的问题所写的一篇论文进行评价和批评。他邀请了世界各地和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参加本次研讨会，他们中的一些专门写了扩充性评论，这些文章

都收录在丹尼斯·缪勒 (Dannis Mueller) 主编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一书中。我对罗宾·马里斯发起这次研讨会, 对丹尼斯·缪勒主编并撰写会议论文深表感谢; 对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为本次会议和论文集的出版提供资助深表感谢; 对 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和日本教育部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Japan) 为本次研讨会的路费提供资助深表感谢。最后, 每个参加会议或撰写论文者对我的帮助可能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下面简单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和单位, 尽管这样可能未必恰当。

Moses Abramovitz (Stanford U.), J. C. Asselain (U. de Bordeaux I), Ragnar Bentzel (Uppsala U.), James Blackma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amuel Bowles (U. of Massachusetts), Myles G. Boyla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amilo Dagum (Ottawa U.), James Dean (Simon Fraser U. and Columbia U.), Stephen J. DeCanio (U.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Edward Denison (U. S. Dept. of Commerce), Roymond Courbis (U. of Paris), John Eatwell (Trinity, Cambridge), Walter Eltis (Exeter Oxford), Francesco Forte (U. of Torino), Roymond Goldsmith (Yale U.), Jean-François Hennart (Florida International U.), Gudmund Hernes (U. of Bergen), John Hicks 爵士 (All Souls, Oxford), Ursula (女士) Hicks (Linacre, Oxford), Helen Hughes (World Bank), Charles Hulton (Urban Institute), Serge-Christophe Kolm (CEPREMAP, Paris), Hans

Juergen Krupp (U. of Frankfurt), Franz Lehner (Ruhr U. Bochum), Harvey Leibenstein (Harvard U.), Edward J. Lincoln (Johns Hopkins U.), Edmond Malinvaud (Ins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Paris), R. C. O. Matthews (Clare, Cambridge), Christian Morrisson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Daniel H. Newlo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Yusuke Onitsuka (Osaka U.), Sam Peltzman (U. of Chicago), Richard Portes (Birkbeck, London), Frederic L. Pryor (Swarthmore College), Walter Sala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Hans Soderstrom (U. of Stockholm), Ingemar Stahl (U. of Lund), Carl Christian von Weizsacker (U. of Bonn), Hans Willgerodt (U. of Cologne), Wolfgang Zapf (U. of Mannheim)。

同样，感谢罗杰·本杰明 (Roger Benjamin) 让本书的部分早期草稿引起了政治科学评论家的关注；感谢 Marian Ash, Myles Boylan, Jan de Vries, Stanley Engerman, I. M. D. Little, R. C. O. Matthews 和 Edmund Phelps 等提供的慷慨帮助；感谢牛津大学 Nuffield 学院，特别是 Brian Barry 在我对本书进行早期构思时提供的照顾和评论；感谢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的成员，特别是 Emery Castle 和 Joy Dunkerley 的耐心鼓励；感谢参加 Lehrman Institute 围绕本书草稿组织的研讨会的人员，其中特别感谢 Donald Dewey 和 Kelvin Lancaster。我的夫人，艾利森·G. 奥尔森 (Alison G. Olson)，作为一位专业历史学家，特别欣赏散文的重要性，因为散文可以非常人性化地避免使用专业性的技术词汇，感谢她为本书写作风格提供的极富价值的建议，

并感谢她为我在写作中做的许多其他方面的事情。我的兄弟，Allan 和 Gaylord 也通过各种方式给予了帮助。

我在马里兰大学经济系的同事都特别慷慨和充满激情。我必须强调，由于这本书占用了我大量时间，马丁·J. 贝利 (Martin J. Bailey) 对我在我俩的合作研究中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耐心。克里斯托弗·克莱格 (Christopher Clague) 多年来一直对本书和我的其他一些著作提供了有益的细心评论；查尔斯·布朗 (Charles Brown) 和保罗·梅耶 (Paul Meyer) 也对本书的草稿提供了批评性建议。阿黛尔·克罗克斯 (Adele Krokes) 提供的帮助需要特别强调，不仅因为她为本书的打印和文字排版提供的帮助，而且还因为她在帮助我组织让人兴奋的学术生活上非常有效率的方式。我要感谢在完成本书的那些年中一直对我提供研究帮助的人，特别是 Terence Alexander, Kwang Choi, Brian Cushing, Cyril Kearn, Douglas Kinney, Natalie McPherson, James Stafford, Fran Sussman 和 Howell Zee。

最后，有许多人阅读过本书的前两稿，并进行了评论。我不仅对前面已经提到的学者再表感谢，还对下面列出的学者表示感谢：Alan Blinder, Roger Boner, Barry Bosworth, Shannon Brown,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Martha Derthick, Dudley Dillard, Bruce Dunson, James Galbraith, John Goldethorpem Donald Gordon, Daniel Hausman, Russell Hardin, Michael Hechter, Gail Huh, Peter Katzenstein, Donald Keesing, Robert Knight, Robert Mackay, Cynthia Tuffy Morris, Douglas North, Joe Oppenheimer, Clarence Stone, Maura Shaw Tantillo, Charles Taquey, Neil

Wallace, Oliver Williamson, 以及 Horst Zimmermann。

不幸的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合理地处理对我著作较近期的一些批评。我很担心自己没有能够完全理解其中的一些批评。尽管我坚持了一贯采取的研究策略，但我仍然固执地没有采用其中的少数一些批评，包括最严厉的一两个。因此，本研究中仍然存在的错误——我担心，由于本书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这种错误还非常多——完全由我自己来承担。